



◆ 程美东 张晓峰 著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革命观

20世纪 中国革命理论与 中国现代化的 历程

济南出版社

D6
5·9

20世纪 中国革命理论 中国现代化的 历程

程美东 张晓峰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革命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革命观/程美东、张晓峰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2. 10

ISBN 7 - 80629 - 805 - 3

I. 2... II. ①程... ②张... III. ①孙中山 (1866 ~ 1925) — 革命理论—研究 ②毛泽东 (1893 ~ 1976) — 革命理论—研究 ③邓小平理论：革命理论—研究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1266 号

责任编辑 胡瑞成

封面设计 吴殿魁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250001)

印 刷 山东省恒兴实业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875 印张

字 数 246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济南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序

我的学生程美东送来他与张晓峰合著的《20世纪中国革命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并要我写几句话。我把书稿读了一遍，觉得不错。立意很好，论证得也比较清楚，读后使人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关系一目了然。小程是个很勤奋的人，做学问十分认真、踏实，而且有自己的想法。他的研究成果很多，有一定水平。所以，他写的这本书，是有学术价值的。当然，没有一本书是十全十美的，这不打紧，出版以后，可以听取读者意见，或修改，或用在新的研究成果上。总之，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本书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称之为革命理论，我倒觉得不如称之为现代化理论更为恰当些。为什么？因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逼进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呈现出被动社会现代化的状态。这种被动的社会现代化，被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所控制，发展极其缓慢，不仅不能实现社会现代化，而且无法摆脱贫困、落后、挨打、受辱的境地。显然，在中国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只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使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才能够主动地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社会现代化。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理论应该包含着两部分内容，即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理论和主动社会现代化理论。孙中山从事社会改造的实践，是要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他的理论包含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两部分内容，这就完全符合现

代化理论的两个部分。毛泽东的理论也一样，不过他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的理论则完全是现代化理论的第二个部分。可见，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称之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正是在这三位伟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首先结束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继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三位伟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才不断积累，没有这样的积累，也就没有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这三位伟大人物的现代化理论，指导现代化事业的进程取得成绩的程度之大小，与理论本身的是否完善有直接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能不能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关于社会改造的理论时，发现它的弊病，没有照抄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但是，孙中山对中国国情没有研究透彻，特别是对其自身的阶级基础的特性没有掌握，致使他的理论在解决实际时遇到了麻烦，很多问题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解决，而他又不幸过早逝世，没有来得及深入了解实际以调整理论上的缺陷。孙中山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贡献很大，可惜他的事业半途夭折了。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正因为这一理论紧密地与中国实际结合在一起，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功永不可没。但是，到他的晚年，身居高位，远离实际，在对实际情况不掌握或掌握不准甚或本末倒置的情况下，盲目下结论，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从而导致出现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错误。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发展的新阶段。正因为这一理论紧密地与中国实际结合在一起，才领导中国人民克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重困难，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崭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邓小平去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前进。这一切说明，理论一刻也不能脱离实际，否则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挫折，就不能顺利发展。

写了上边一些话，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这本书，引出更多的思考。

张静如

2002年4月15日

前　　言

19世纪，是中国人从空幻的“帝国”盛世的自醉中轰然跌入遭受殖民迫害的苦难深渊、茫然无措的世纪。

20世纪，是中国人逐渐觉醒、愤然跃起、慷慨悲歌、挑战旧世界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英才辈出，群星璀璨。男儿或奋笔疾书，四处呐喊，努力唤醒万千迷茫民众的爱国心；或纵横疆场、置身枪林弹雨之中，试图锻造出一个各自理想的生存模型。女儿更是一扫千年红妆，冲出禁闭久远的牢笼，第一次冲向学校，冲向工厂，冲向社会。20世纪的中国，固然多灾多难，人民备受艰辛困顿、颠沛流离之苦，但中国人活得坚强、勇敢，活得有骨气、有希望。20世纪，证实了中国人不仅有在辉煌的业绩面前能昂首挺立、自信自强的气度，也有在屈辱落后的现实面前能敢于“涅槃”、敢于抗争、勤于试验的毅力。20世纪的中国，是一篇久长、恢宏、苍凉、汹涌澎湃的交响乐；而这篇不平凡的乐曲的主旋律便是革命与改革！

从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直到20世纪后20年掀起的崭新的“改革”浪潮，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都被冠之为“革命”（“文革”当然不是真正意义的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真正成了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这三大革命性运动以惊心动魄的场景，一章章地书写了中国的近现代史，一步步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三次革命前后相继，相互之

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缺一不可，犹如《诗经》之《风》、《雅》、《颂》，缺一而不可以为《诗经》一样。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年蹬专制王朝体制，把中国内部腐朽霉烂的主要根子彻底地加以铲除，播撒下民主共和的种子，使得民主、自由之花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理想，断绝了一切腐朽没落分子复辟王朝的梦想。中国遂只能在世界进步潮流中顺流而行，除此别无选择。于是，中国共产党便在这进步大潮中应运而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有了发生的源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把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大业，终于完成了。中国从此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山河破碎、列强横行的涣散状态，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主权独立、国家统一的内外条件都具备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日可待，前景无限美好。

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孙中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国家、民族的富强、民主、文明、独立，不得不抛头颅、洒热血，不得不用严酷的武装、暴力的形式来扫清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革命——“暴力式革命”便成了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进步的主旋律，为中国、为世界的进步留下了灿烂、壮烈的辉煌历史篇章。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却不能及时地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去进行我们的建设事业。帝国主义制裁我们，蒋介石集团想反攻我们，于是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那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却得不着和平发展的良机。后来，我们又犯了一系列的“左”倾错误，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几至于停滞，中国痛失 20 年的发展机遇，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何去何从？

历史的车轮碾到了公元 1976 年。“文革”结束了，中国人从噩梦中走了出来，但是他们却茫然不知将要走向何方。

两年的徘徊，两年的沉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惊雷，催来了改革开放春天的降临。

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如是说。

是的，改革的确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更深刻、更广泛、更艰巨的革命。暴力式革命是为了除旧布新，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经济上，从传统的人民公社体制，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分田到人；从“割资产主义尾巴”到开放市场，再到“夫妻店”、雇工劳动的出现；从“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模式到讲究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这个过程中哪一件不是伤筋动骨的举措？

在政治上，从以“思想定罪”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口号的提出，再到“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制定；从“出身论”、“唯成份论”到“分数论”、“能力论”；从“一言堂”到“集体领导”制、“人大罢免”制；从领导干部职位终身制到退休制；从高高在上的官员制到普普通通的公务员制的确立……这些新举措实行的过程中哪一件没遇到重重阻力？

在思想文化上，从屡设禁区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从“忠字歌”、“忠字舞”到流行音乐、迪斯科；从清一色的“二刀毛”、绿军装到烫发、黄发、喇叭裤，再到流行色……这些过程又有哪一个不充满了“世风日下”的怨谤声？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比暴力革命更艰难复杂的过程，而且其意义也更为重要。所以，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阻碍我们前进的陈规陋俗在我们的社会扎根太深。

所以，我们讲，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便是革命，即辛亥革

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中国应该感谢这三次革命，是这三次革命把中国从列强蹂躏下的积贫积弱状态中拯救出来，一步步推向世界进步的潮流之中；中国人民应该感谢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他们三人分别领导了这三次革命。“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①江泽民同志的评价是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好的概括。

20 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个多灾多难、不屈不挠、争取光明的世纪，如何从这个已经逝去的世纪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是一个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既然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是革命，是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那么我们就要认真地去研究这三次革命；要研究这三次革命，就必须首先研究这三次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革命思想，了解他们关于革命思想的来龙去脉，了解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 20 世纪的一笔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扬光大，以服务于 21 世纪我国的现代化实践。

程美东
2002 年 8 月

^①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革命释义	(1)
一、中国传统之革命	(1)
二、传统“革命”的超越	(3)
三、社会主义革命的选择	(7)
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义	(9)
五、革命的诸种涵义	(12)
第二章 孙中山的革命观	(14)
一、孙中山革命观发展的历程	(15)
(一) 革命观的孕育	(15)
(二) 三民主义革命观的形成	(20)
(三) 新三民主义观的形成	(26)
二、孙中山革命观的理论体系	(41)
(一) 革命指导思想论	(42)
(二) 革命力量论	(89)
(三) 革命政策论	(98)
(四) 革命精神论	(110)
三、孙中山革命观评说	(117)
第三章 毛泽东的革命观	(123)
一、毛泽东的早期革命观	(125)
(一) 压抑与叛逆	(125)
(二) 启蒙与传统	(130)

(三) 从空想到科学	(141)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147)
(一) 革命发生论	(148)
(二) 革命性质论	(154)
(三) 革命道路论	(166)
(四) 革命实质论	(170)
(五) 革命转变论	(178)
三、毛泽东的晚期革命观	(195)
(一) “革命”的泛化	(196)
(二) 泛化革命的恶果——阶级斗争扩大化	(202)
四、毛泽东革命观评说	(214)
第四章 邓小平的改革观	(223)
一、从“革命”到改革	(225)
二、改革背景论	(230)
三、改革实质论	(233)
四、改革的理论体系	(243)
五、经济体制改革论	(254)
六、政治体制改革论	(263)
七、文化科教体制改革论	(284)
八、邓小平的改革观与中国现代化的命运	(293)

第一章 革命释义

一、中国传统之革命

何谓“革命”？国内权威辞书解释如下：实施变革以应天命。“革命”一词古已有之，《周易大传》革卦文中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谓汤武革命，就是汤王讨伐暴君桀建立殷王朝，武王讨伐暴君纣建立周朝。中国古代之革命，意即“鼎革”，指一代帝王之得天下乃受“命”于“天”，即“君权神授”，以肯定“天命”为前提，皇帝是“天”之“子”，是秉承天帝之命来统治天下万民的。“天”是中国古代的最高思想权威，所谓“天命不可违”意即此。皇帝既然是“真龙天子”，当然是秉承天命为民作主的。而“革”就是变革，革除。所谓“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也就是天帝要将无德之朝代帝王革除，另命有德之帝王。因为腐败的皇帝违背了“天”的意愿，所以“天”要革掉这个腐败的皇帝，另命有德之“真龙天子”。那么天如何来革除腐败的皇帝呢？就是降之以灾害，使人民的忍受达到极限，人民就必然要揭竿而起，推翻这个腐败的皇帝，然后另命“有道者”取得王位，成为新的皇帝。所以，中国古代的所谓“革命”，主要是指改朝换代，即“易姓革命”，如李姓王朝换为赵姓王朝之类。

因为“革命”是基于政治不善才发生的，所以“天子”要“顺乎天、应乎人”来行善政，如果违反天意，天帝便排斥此人，

也就是开始“革命”之时。这样的革命要求打倒旧政权、创建新政权的人本身行为正当，能使民众诚心接受才行。《书经·汤誓》中记载汤王讨伐夏桀时，对民众起誓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予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意思是说自己并不是刻意想引起战乱，而是桀王罪过太多，上天命我讨伐他的。黄巾起义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中国的天子是秉承天命的，从天命的观点来得到其政治的合法性。假如在位的皇帝很腐败，从儒家的政治思想看，腐败的皇帝不是皇帝，如孟子所说的：“吾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既然腐败的皇帝不是皇帝，人民就有权起来打倒他。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伟大观念，即人民有权利反抗腐败的政权。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早有民主的观念，因为把这个腐败的皇帝打倒后，还是由一人秉天命来取得王位，作人民的统治者。事实上，这样的政权更迭，多是马上打天下，把其他势力打倒之后，就宣称自己是得到天命的“天子”了。换言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样的“革命”，在中国不绝于史。

近人梁启超把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分为“上等社会之革命”与“下等社会之革命”。所谓上等社会之革命，成者有唐高祖、宋太祖、明成祖；败者有汉初异姓诸王、汉文景间同姓诸王，东汉末诸牧、晋十六国之强半、唐之蕃镇、五代时诸方镇、明宸濠等、清初之三藩及台湾。所谓下等社会之革命，成者有汉高祖、汉光武、明太祖；败者有汉初之陈胜、项羽等，西汉末之赤眉王郎等，东汉末之黄巾等，隋末之李密、窦建德等，唐末之黄巢等，元末之张士诚、陈友谅等，明末之李自成等，清之洪秀全等。

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即改朝换代大多是通过农民起义实现

的，农民起义之“义”就是反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要求平等。中国传统的“革命”思想可以分为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儒教“革命”思想和农民的“革命”意识。前者如汤武“革命”、唐宗宋祖的改朝换代，后者是农民起义的平等思想。这种思想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对立中也明显反映出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把基督教原始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平等观念结合起来形成太平天国革命思想，在“天父皇上帝”的名义下，激烈反对和排斥中国正统思想的儒教、道教、佛教等精神权威，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人不饱暖，无处不均匀”的绝对平均主义。与此相对，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军的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以维护儒教为号召，大呼“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岂可袖手安坐，不畏一为之所也。”

二、传统“革命”的超越

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连连战败，面临这种危机，一部分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发起了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启蒙知识分子为中心又发起了以立宪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种种探索。但是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推进现代化是相当艰难的课题。特别是甲午战败后清王朝权威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的中国，仅仅以传统的“易姓革命”是难以维持自己的。这就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必须接受与传统“革命”不同的近代的 Revolution（革命）观念。

近代袭用“革命”这个名词，与传统“革命”含义不同，指的是“政治或社会急剧根本之变革”。章太炎在为邹容《革命军》所写的序言中就提到：“谅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己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革命也。”章氏这种想法，可以代表19、20世纪之交中国人受西方观念“Revolution”影响之后所产生的新诠释。所以要明白近代“革命”的含义，必须先了解何谓“Revolution”。

“Revolution”一词的涵义，在西方并非十分确定，也非一成不变。英语世界中最早使用这个词是在克伦威尔时代。在此之前，拉丁文的“Revolutionibus”原来是用在天文上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群星的规律性循环运动”，其中既没有创新，也没有暴力的涵意。后人将天文学上的循环加以引申，认为是结束旧的循环，开始新的循环。再后来就是变成某种运动的轮回，以寓言的方式，表示人类命运的起落流转，正如星之绕日。直到17世纪，这个词才第一次变成政治上的名词，意指“归返到原本的状态或预定的秩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时代的所谓“Revolution”，并不是用来描述由克伦威尔所率领的议会派清教徒“新式军队”建立“自由共和国”的行动，相反是指英国1660年推翻克伦威尔议会政府，回复到斯图亚特旧王朝的行动。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仍没有近代 Revolution 的意思，而是指复古式循环。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美国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更提供了政治革命的典型范例。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认为 Revolution 应包含 novelty（新颖）、beginning（开端）以及 violence（暴力），后来又加上 irresistability（不可抗拒）之意。进入19世纪，这个字更清楚地转化为“历史的必然”（historical necessity）。参加过美国革

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潘恩说过：“过去所谓的革命，就像平常的事情一样，时起时落，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命运丝毫也不足以影响发生地点以外的地方。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从美国和法国革命所看到的，却是事物原有秩序的更新，是一个由若干像真理和人类生存那样普遍的原则构成的体系，是伦理同政治幸福和国家繁荣的结合。”这里所说的“原有秩序的更新”不仅是指政权性质的改变，而且是指社会的改变。这样，革命由原来的政治性，扩及到经济性与社会性，由原来的国内革命扩及到世界革命，成为近代革命。近代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了革命这个概念的。

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使中国大陆成于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之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至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①邹容为革命而大声疾呼，热情高歌。“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文明之政权、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②这个革命完全是效法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

胡汉民分析中国历代之“革命”的首领“其胸中只知皇帝之可贵，而未识民权之大义也”，而“为今后之革命军计，有至不可忽者，第一树国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建立民权立宪政治，以举行自由平等博爱之实，斯二者其根本也。”他还明确指出：

^① ^②邹容《革命军》。